

林连玉应和蔡寰青《书感》组诗及其“中国观”¹

邱克威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中文系)

摘要：林连玉和蔡寰青的《书感》唱和诗作于 1949 年底，这正是中国国共内战尘埃落定，其政治局势转入新阶段的时刻。二诗分别对时局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表态，这让我们理解新马华人知识界在 1949 年中国政治形势变化之际的感情与思想历程，乃至其整体“中国观”的其中一个侧面。此外，林蔡二人秉性与诗风上的巨大差异，使得这组唱和诗除了政治与思想层面的分析，还值得我们对蔡寰青诗歌纯熟的用典与藻饰技巧进行探析，并由此挖掘出林连玉诗艺出雅入俗的另一层面；即由于应和诗的形制要求，林连玉这组诗表现出稍异于其往常的浅白口语特征，黄润岳总结为“指事通俗，文词典雅”。同时蔡寰青组诗本就结构严密，前后关照；而林连玉和诗对蔡诗更是字句紧紧相扣，无一字落空，使得这一组唱和诗堪称为本地旧诗创作的上乘作品。

关键词：林连玉； 蔡寰青； 书感； 唱和诗； 中国观

A Study on the ‘*Reflection of Thoughts*’ Antiphon Poetry Between Lim Lian Geok and Cai Huanqing and Its ‘China-notion’

KHOO Kiak Uei

(University of Xiamen Malaysia)

Abstract

The ‘Reflection of Thoughts’ antiphon poetry between Lim Lian Geok and Cai Huanqing was published in late 1949, during a time when the civil war in China has just subsided, and the political arena in China has entered into a new phase. Both poems exhibited their individual analysis and opinions regarding this current issue, hence gave us a glimpse of the emotions among the intellectual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owards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China during 1949, which implicates a portion of the ‘China-notion’ among these intellectuals. Besides, the difference in character and thinking of both Lim and Cai, that reflects through their poetry, especially with Cai’s skillful articulation and literary allusions, it helped bring out the other less-known side of Lim’s art of poetry, which Huang Runyue summarized as both colloquial and elegant. Overall, due to the superb structure of Cai’s poem and Lim’s excellent art in matching word and sentence with Cai, these make both works among the highest quality poems in both Singapore and Malaysia.

Keywords: Lim Lian Geok; Cai Huanqing; Reflection of Thoughts; Antiphon poetry; China-notion

¹ 本文甫就，感谢徐威雄与詹敬仁二学兄提供意见。

绪论

从历史来看，新马华人对于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发展一直都非常关注，乃至投身参与，这就涉及华人在地化与身份认同的演变与发展。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非常多，其中对于华人支持并参与革命运动与抗日运动的分析讨论尤为集中，乃至 20 世纪之交维新与革命二派主张在新马华人社会中产生的阵营划分也较受关注。实则纵观 20 世纪以来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各种动荡，包括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乃至北伐后形成南京与武汉二集团的权争，新马华人群体都起而纷纷表态并献议；更不用说国共二党的斗争以延续于冷战时期的左右阵营，这些都切切实实地牵动着新马华人社会的脉搏，包括华人知识界在这些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史的每一个关节点上都直接或间接参与，最低限度都公开表态乃至进言。

然而至今关于 1949 年国民党败退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马华人群体中的知识界如何看待并评论这段历史，则似乎较少探讨。以新马华人知识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林连玉为例，他在 1920 年代南来以后所写的多篇诗文中都表现出高度关注中国的政治局势；尤其在 1949–1951 年之间写了大量讨论中国政治与社会形势的诗文，论者称这段期间的“林连玉是中国的热心观察者”（鲁虎 2014：215），特别是杂文内容包括对于国共二党施政上的评论，乃至身处新马华人社会在这种新旧势力对峙下的现象观察与分析。

其实深入探讨，我们会发现不论是当时整体华社知识分子，乃至林连玉身上都透露着比平面表态更为复杂的多层级面貌，包括时地因素中的变数，绝非仅仅是拥护或同情的立场。比如林连玉对中共政权的评价初期较多正面，实则更应置于国民党腐败统治的对比语境来看；但尤其 1950 年下半年以后随着中共治下某些极端思潮与风气显露而其批评也多了起来。然而纵观这时期的著论，其始终反对统治者“一面倒”的极权表现，以及民本主张则是一贯的。

本文将分析的林连玉《奉和蔡寰青先生书感元韵》组诗，发表于 1949 年 12 月 25 日²，正是中国境内国共内战乱后初定的时候。首先是蔡寰青于当年 12 月 13 日写了一首《书感》，表现出鲜明的拥护国民党立场；当然诗中抒发自己对国内形势的感慨，多有哀悯生民之叹，尤其透露着一股传统文士的历史沧桑感，但重点是全诗预设为国民党正统的立论，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这与蔡寰青同时期多感怀身世的抒情诗作小同而大异；因此虽则诗题明言“敬呈诸大吟坛正和”，但却与其前后多番征和诗的群咏汇聚场景判然两极——除了林连玉，这一首组诗近乎无人应和。

林连玉则从来都不是蔡寰青唱和诗友群内的一员，如今所见其应和蔡诗也仅二首，且明显都是就事说理，含有指误规诫的意味，绝非一般诗友唱和；可知林连玉的《书感》和诗不是以诗会友的酬唱，而纯是出于分析时局上的说理，尤其力辩蔡诗对形势的误判。林连玉和诗同样旗帜鲜明，直指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基本为其败退定性为咎由自取；尤其当头棒喝，直给蔡诗寄托国民党反攻的殷望浇下一大盆冷水，表现其立场一贯以民为本，反对任何一己或一家私欲的内战。同时林连玉和诗在顾及酬唱诗体形式的要求下，立论清晰，笔触尖锐；其配合蔡寰青以学养入诗、用典藻饰的风格特征，和诗则字句相呼应，紧扣原诗，也带出了林连玉诗艺中出雅入俗的风格张力，即黄润岳（2005[1990]）总结的“指事通俗，文词典雅”。整体而言，林蔡《书感》组诗的唱和，即使撇开历史与思想层面，其诗歌艺术上仍堪称是本地酬唱诗作的佳品。

此外，这组《书感》唱和诗虽则表现为林蔡二人对 1949 年中国政治局势的态度差异，实际上展示的更是林连玉与蔡寰青二人的不同秉性。这一点在林连玉应和蔡寰青的另一诗作中尤为明显道破，其云：

世事茫茫变靡涯，不堪惆怅说伤时。守身如玉人争笑，中道而行鬼亦欺。只有金刚横怒目，更无菩萨善低眉。悠然一枕南窗下，扰攘由他幻化奇。（林连玉 1986）

² 这组诗同时收录其自编《连玉诗存》（1986：14），然诗题作《步蔡寰青书怀元韵四首》。

本诗题旨显含规诫之意，尤其首联之“惆怅说伤时”确实符合蔡寰青诗风与主题的整体特征，即其自题诗也说“若说哀时吾岂敢，至今私愤总难平”。反观林连玉诗句之“只有金刚横怒目，更无菩萨善低眉”，确是其刚直不阿、嫉恶如仇的性格特质。于是《书感》唱和二诗从感情抒发角度来看，蔡诗虽则确属其整体诗作中难得表现政治立场的“言志”之作，但仍处处流露其托古寄怀、哀世伤时的抒情诗风；而林连玉和诗则不同，字字有力，立论鲜明，说理清晰，直抒胸臆，俨然是其诗艺主张的绝佳注脚，即：“风花雪月我无缘，不画鸳鸯不写仙。振笔但为抒素志，秦刀何必刻婵娟。”（林连玉 1949b）

这里还值得注意的是，林蔡二人作诗的时间与国共内战形势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对照当时新马报章所见连日追踪之更新报道，包括林连玉同时期对中国国内局势发展的观察与评论，足可显示当时知识界极为高度关注这场内战乃至中国局势的未来发展。当然，林连玉这一组诗中分析的国民党败因，纯粹是就事论事，包含他从自身社会政治思想出发所投射之历史规律的诠释，绝不可凭此简单概括为他是“欢迎新中国”的。

林连玉对于 1949 年中国局势的态度

林连玉（1901-1985），出生于福建永春。1927 年下南洋，投身教育工作。1950 年代初推动马来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的成立，成为华社争取华文教育权益的领军人物及代言人。林连玉所树立的精神典范，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共相景仰，推尊为“族魂”。郑良树（1985）于其悼词中尊奉为马来西亚“华族社会第一世家”。

关于林连玉的政治态度和言论，研究者向来多关注其针对马来西亚政治形势的表态；比如何国忠（2002）、何启良（2015）著文专门探讨林连玉的政治思想与态度，另如一些则在研究生平事迹或诗文作品中涉及其政治思想。然而关于他对中国政治形势的观察与发言，则至今还未有全面的专门系统分析。零星的论述如吴彩宝（2019：55-56）曾提及：“从林连玉早期文章的发表时间来看（指 1949 年至 1951 年），较多反映原乡课题”，乃至指出“1951 年可说是林连玉确立从‘中国倾向’转化为‘本土意识’的分水岭时期”。

当然，林连玉对中国政治局势的讨论，其中对于军阀苛政以及“国民党要人”腐败无能的严厉抨击，这方面讨论较多，但主要侧重其思想特征上的分析；至于林连玉对国共内战乃至 1949 年形势变化的立场与态度，却鲜少论及。鲁虎（2012、2014）曾以林连玉杂文为例，着重分析其“中国观”或“中国意识和华人身份”，其中对林连玉关于 1949 年形势的态度算是目前较完整的论述，其云：

在 1949 年后的一段时间里，林连玉是中国的热心观察者。他对国民党要人的腐败堕落深恶痛绝，多次给予批评嘲弄，甚至很自然地在文章中使用“解放”、“新中国”等词汇，显示了他对这场政治变革的欢迎和欣喜的基本立场。然而，林连玉又是一位具有独立意识的批评者。在更多的观察以后，他并不认同中国的一些做法，并以委婉的方式加以指出，体现出爱之切责之深的情感，也表明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倾向。（鲁虎 2014：215）

实则这里的立论有些偏颇。林连玉对国民党统治的批评是基于切身的体会，对其领导的腐败无能肯定是深恶痛绝；然而对共产党执政是否就是“欢迎和欣喜”，乃至对其批评就是“委婉”，且还表明了他的“保守主义倾向”。这显然是论者预设立场的诠释。其实平心而论，林连玉对于国共二党并无“深恶”一方或者“委婉”一方，归结而言他是“民本”的主张；因此对二者往往是各打巴掌，如其云：

现在的世界，形成两大壁垒，两方面都要求“一面倒”了。到底最后大家会倒向那一边呢？我们相信古人的话：“抚我则后，辱我则仇”。人民所要求者，生存也。如果不能

以平等的原则，好好地对待人民，纵然以铁链套住每个人的头项，终究有被扭断的一天。
(纪雪 1950)

而如此“平等”的社会秩序，仰赖的是社会道德，包括统治层的自身道德，其云：“那末，革命！革命！革来革去，总革不掉道德的命，如果敢想革掉道德的命，人家就要你的老命。倘若不信，请看那些不要道德的人们，他那可怜的下场！”（批鳞 1950a）³ 更重要的是，林连玉所提的道德是基于普世价值的道德感，绝非限于“三民主义”、“国父遗嘱”、“辩证法”、“唯物论”等等的教条式口号，更不会是“一面倒”的为某家某党背书。这是其贯彻始终的信念（参看批鳞 1950a、何须名 1950、批鳞 1950b、吴钩 1950a）。更何况他对“新中国”的“嘲弄”也不在少。

归结起来，“一面倒”之政治极权欲望下的种种，包括高呼“伟大！伟大”，包括“一切圆满论”，包括立偶像，不论是国民党、不论是共产党，都是政客们无端生事（参看太璞 1951、吴钩 1950b）；其云：“昨日之事你为政，你可以如彼如彼。今日之事我为政，我偏要如此如此。于是在无问题之中，偏偏闹出问题来了，而且闹得那么严重。”（尤春 1950）

因此他对国共拥护者的“新派”和“旧派”之间的纯立场之争极为厌恶，尤其是罔顾事实的立场争论，更尤其是距离权力争夺中心千里外的新马社会也跟着闹哄哄的。仅以 1950 年就至少因为儿童节与教师节的日期闹了分歧，如林连玉文章提到：“我们马来亚华侨，今年大闹双包案。已过去的，儿童节一起，教师节又一起。尚未来的，国庆日再一起。”（尤春 1950）

这里指的是国民政府定儿童节为 4 月 4 日、教师节为 8 月 27 日，而中共政府则分别定为 6 月 1 日与 6 月 6 日。目前我们在各方记载中似乎看不出当时分歧的程度，报章也仅平和地分别报道各单位各按立场选择（大朋友 1950；南洋商报 1950a），实则综合各方信息来看当时的形势绝不平和。比如林连玉文章下重笔之“现杀”与“赊死”，乃至其连番呐喊“真是够受了！够受了！又够受了”，即可见其一斑；最关键的是甚至还出动英殖民政府当年正式颁布隔年校历，宣布 1951 年儿童节与教师节均分别改定于 6 月 21 日与 10 月 21 日，算是新旧各打一巴掌。（南洋商报 1950b）

其实更重要的是林连玉在这种对峙中看到极权政治“一面倒”立场优先的祸害，其评论展现出他的民本精神特质，尤其是他超越政党的独立思想，云：（尤春 1950）

看旧派的飞短流长，听新派的严厉呵斥，问题似乎闹得严重透顶了。但是，一问实际，却又何等空洞！所谓儿童节，儿童有得到好处吗？所谓教师节，教师有得到好处吗？所谓国庆日，国家有得到好处吗？这一问，我敢说：不论新的或旧的，都会哑口无言，心照不宣的。

呜呼！噫嘻！所谓双包案，原是大包小包，都是没有馅子的馒头（假包子）。而一年之中，偏偏由人事的意气，制造那么多，给你享用不了，真是够受了！够受了！又够受了！

...

而这人造的假包，新的，要强迫你接受，不接受，你就有罪。旧的，又要强迫你接受，不接受你也有罪。不论新的或是旧的，接受下来，都有危险，一个危险在眼前，一个危险在将来。这又是够受了！够受了！又够受了！

这够受，何时得了呢？瞻望前途，不禁又要呼出：够受了！够受了！又是够受了！

这一简短文字内的连番疾呼“够受了！够受了！又是够受了”，除了是林连玉对政治操控的极端厌恶；实则更突出体现林连玉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即其“瞻望前途”的忧心。

³ 林连玉 1949-1951 年期间在报章发表的文章很多使用笔名，本处所引“批鳞”就是其一，另如下文所引“尤春”、“何须名”、“吴钩”、“太璞”、“纪雪”等都是。下文不另出注。关于林连玉发表诗文所使用的笔名，较完整的列表见吴彩宝（2019：134-144）。

此外，林连玉早在 1949 年 10 月就已公然表态，坚决反对“更改国庆”，其立论纯是事理的分析，云：“说起我国的辛亥革命，无疑的，是我国五千年历史上最高的分水岭，决不是普通的历史里程碑。在此以前，是君主专制的局面；在此以后，是民主政治的开始。”（批鳞 1949）这与其近乎同时讨论“总革不掉道德的命”一样，绝不偏袒政党、毫无预设立场，而是纯理性的历史规律分析。因此若论其主张的“道德”，则毋宁说可理解为一种“历史正义”。这是根基于两千年的史学传统，即孟子“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信念；然而却绝非一党一家维护“正统”的历史所谓“正义”，乃其自有“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的气魄。这毕竟不免书生气，却正因此造就林连玉之投身社会政治漩涡中能立足高于一般政客野心家的姿态；同时其思想层面之儒家特质，莫不以此为本。

这正是我们把握林连玉针对时局的态度乃至其政治主张的关键，而非简单摘取某些言论而为其圈定政治立场，或进行左右编排。实则这一点黄润岳（2005[1990]）早在林连玉逝世几年后就已委婉道破，尤其关于“林连玉被看成左倾分子”的言论，其云：“至于左倾，不知以什么标准来评定。今天来看左右，已经是泾渭不分了。”

蔡襄青诗风及其《书感》

蔡襄青（1907-1970），出生于广东澄海书香世家，1940 年避乱南下新加坡。目前对其生平与创作的论述近乎从缺，包括作为岭南画派重要传人与代表，以及新马两地创立书画社与从事书画教育贡献良多，然而钟瑜（1999）整理本地美术史竟然只字未提。

根据蔡襄青（1952）自述，早年受传统教育，古学根基较好；十余岁开始从多位名师习画，并于三十岁左右在家乡办过两所小学。二战后他曾在新加坡创办“南洋金石书画社”。其创作非常丰富，综合各方资料，1949 年出版《戊子咏怀酬唱集》以来，历年出版的多部著作，如诗集有 1950 年《今战场》、1959 年《战马吟》，又如 1952 年刊印画册兼题画诗集《未庵画记》，再如 1950 年主编《古今杂志》、《微风》，后者为旧体诗刊。他生前在各地办过无数场画展，尤其多为学校筹款的慈善画展。他曾担任南洋大学讲师、马来亚大学中文学会国画导师，并曾受黄润岳邀请执教于柔佛州新文龙中华中学。黄润岳（1962）曾著文高度赞誉其诗书画印四绝，如云：“他的金石和他的书法一样，刚强之中有珠圆玉润之气，用力不苟而又不落俗，自是一格。至于诗词一道呢，造句遣词，已是炉火纯青的了。”然而非常可惜的是，自其逝世以来几乎是已被遗忘，包括当年备受称道的四绝，因此其“炉火纯青”的诗歌艺术也同样至今未见系统评论。

以下我们结合蔡襄青的个人性情与整体诗风，据此解析其刊于 1949 年的《书感》组诗。

首先，林连玉《奉和蔡襄青先生书感元韵》是应和蔡襄青《书感》组诗而创作的，1949 年 12 月 25 日刊登于《南洋商报》。蔡襄青《书感》为一组八首七言律诗，均同样发表于《南洋商报》：12 月 13 日刊登前四首，副题云“七言律四首，敬呈诸大吟坛正和”；12 月 20 日刊登后四首，副题云“续前七言律四首”。另外，同样《南洋商报》在隔年 1 月 5 日、6 日又一次分两期刊登蔡襄青的这一组八首《书感》，并两期均附上副题“敬呈诸大吟坛正和”。

蔡襄青这组诗是征求应和的；报章上相隔约一个月的二次刊登，估计与此不无关系，即一反其往常的征和诗之众相唱和，这一组诗竟然无人回应，包括其众多诗友。⁴ 查阅蔡襄青在同期的几首征诗作品反应都奇佳，各地应和者众多，尤其是 1948 年底的二首诗作：《戊子咏怀》八首七言律、《秋思》四首七言律。其《戊子咏怀》更在不到一年时间就将唱和诗作结集出版，报道云：“本坡诗文学家蔡襄青，去岁赋咏怀诗八律，向国内外吟坛征和，酬唱甚多。蔡君近特纂成第一

⁴ 此外，当然也可以考虑错字问题。然而一来当时刊登诗作常有错字，有时事后刊登勘误表，有时则忽略不计。更关键的是，本诗前刊虽有些错字，但实在不多，反观后刊也同样有错字。以前四首为例：前次刊登的第三首“板荡居贞原自惜”的“原”错为“厚”、又第四首“背淮千里正归吴”的“淮”错为“准”，后刊均纠正；后次刊登的错字则如第一首“喋血真堪诛吕氏”的“喋”字错为“噓”，又第四首“虽然能数檀家米”之“米”字错为“来”。

辑，于昨八日出版，藉以提倡风雅。凡和诗三十七家，均为诗坛名流。”（南洋商报 1949a）相比之下，《书感》则仅林连玉一人应和其“半组”前四首。

《戊子咏怀》、《秋思》和《书感》均为同时期的创作，加上一首《书感》后十天发表的《读史四咏》，这属于蔡寰青这期间内的所思所想。从内容题材上看，前二首为抒发寄情，主要表达客处羁留，去国怀乡，却因战乱归不得的忧思，后二首则表达他对逢此乱世的一些感悟和主张；《读史四咏》为借史发挥，但仍多为抒怀，《书感》则直陈对当下时局的主张，是蔡诗中少见的言志之作。其实从整体思想感情出发，同期四首则一脉相承。如其《戊子咏怀》云：

海上卢敖久未归，江山如此恨轻违。寻巢燕老花频落，出谷莺娇柳尚依。……思量去国几时才，十载三年恨事该。代马怯寒应莫往，越禽恋燠却重来。

又如《秋思》云：

中原到处有名城，不去都因正用兵。回首关山秋尚远，伤心海徼我徒行。那堪一湿思君泪，不禁三生怆客情。月白天涯凝望久，青衫几点露初盈。

这两组诗中多感怀身世，而《戊子咏怀》之自题小字注更是明言诗句本事，如云：“甲申岁幼子殇，内人死，长男为从兄挈走饶中，长女寄居胞姊家，次男次女相继流亡，间入诏安云霄等处，至今消息渺然。”又忆其当初离乡情景，云：“当船渡海时亲旧多来力阻。”似此感时伤世的愁绪，于《秋思》则更甚，尤其末首最为代表，云：

不堪摇落便惊闻，苏颍何心且莫云。十载江山骄客梦，百年刁斗净妖氛。来寻瘴水蛮烟外，果是青天碧海分。惭愧星槎安放处，襟期原自拟凌云。

通观其二诗之主旨均以抒怀，即其战乱年代中的个人遭遇与羁旅，且常将自己置身于历代乱世诗人行列中，念天地之悠悠，同怆然而涕下；尤其魏晋南北朝文人在乱世中的际遇不幸，更是他往往引为同悲的对象。然而，关键是与其感怀身世以借题指控野心家制造兵乱，他更多则是细细咀嚼内心的苦闷，乃至深深沉溺世途的无常，终而难免心生寄情诗文书画而遥和古人的消极念头。如《秋思》开篇云：

最难消受是清秋，贯酒依然不敌愁。人意真如丛菊淡，客身宛似倦云浮。懒吟词赋陪雕辇，且喜江山入画楼。欲唱疏花霜正降，一声新雁过南洲。

因此其诗作往往借古代乱世诗人以自况，如1949年的《奉酬海角诗人》云：

戴仰萧曹意若何，相思无限动悲歌。杜陵井邑离家久，庾信江关入梦多。漫道飘零来海角，只应措手挽山河。羡君咳唾生珠玉，字字真情细细哦。

最具代表的则应属其《书感》后紧接着发表的《读史四咏》，分别题咏身处魏晋南北朝之乱世中四位命途多舛的诗文家：阮籍、王融、沈炯、孙楚。这四人均是置身政治内斗之中，或如阮孙二人之抽身其外，或如王沈二人之投身其中，均不免浮生颠沛。其“阮籍”云：

穷途辄哭事何奇，赢得咏怀几字诗。奏记犹矜青白眼，辟书且喻去来时。伤心魏晋逢多故，感慨都亭抱不羁。毕竟清狂还请乞，谬思长是起人疑。

这里一反自来对阮籍评价正反两极化框架，不论颜延年称其“沉醉似埋照，寓辞类托讽”⁵的密识洞见，更不论颜之推责其“沉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⁶的无礼败俗。他主要投注在阮籍身处政治斗争中的无奈，及其借诗文以咏怀；尤其开篇直是借阮籍而自况其“忧思独伤心”。同时他咏阮籍云“辟书且喻去来时”，以及咏孙楚之“凄然增重才真藻，隐尔韬光少独奇”，都

⁵ 语出颜延年《五君咏》之“阮步兵”。

⁶ 语出颜之推《颜氏家训》之“勉学篇”。

表明他遁隐词赋的心迹；何况其咏王沈二人均也多涉其诗文事迹，如咏王融之“蹈节资忠迹匪轻，伤心矫诏不胜情”⁷，又咏沈炯云“凄绝通天台畔路，烟霞俯仰信伤神”⁸。

蔡襄青如此“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纯文人气质，1950年其自题第一部诗集《今战场》时表现最突出，其云：

夸骚称圣作诗评，不许英雄脾肉生。眼底全无孙子将，胸中独有范公兵。辞章未必输韬略，史笔何曾擅纵横。似我专场原岂敢，锦袍虽赋让知名。

更其1959年第二部诗集《战马吟》出版的自题诗亦云：

不存诊诤只缘情，吐属惊心混角声。若说哀时吾岂敢，至今私愤总难平。

其中“辞章未必输韬略，史笔何曾擅纵横”一句最能概括其艺术主张，尤其是他诗作中的思想内涵；而其十年后对自己诗作主旨的断语更是一语中的，即“若说哀时吾岂敢，至今私愤总难平”。这种乱世中“重文”的本质，在其挚友蔡映澄（1950）看来更清晰，如其题赠蔡襄青主编《微风》诗刊时有云：“文章事业余灰烬，辞赋江山入劫魔。此老有心扶正气，庾新鲍逸费搜罗。”

当然，值其时局多变的年代，如此“爱上层楼”的文气表现，难免时人相乖，乃至蔡襄青到了1953年《归思》仍在遣其乡情之怀，云：

归计岂真未可为，间关当日忆来时。天风破雾飘零雨，海水争云错落漪。笑指高翔终避缴，惊看覆逆尽飞棋。呼嗟不觉伤危坠，一十三年念在兹。

更其1956年不论中国国内还是新马都逢形势巨变，而其仿杜甫秋兴诗所做《春兴》犹是那番“一十三年念在兹”的乡情，如其云：

江山万古一飞棋，兴废如今未可悲。天上星回新岁月，人间春满少年时。六桥烟水寒消尽，五岭莺花暖去迟。我是天南游客久，不堪回首动乡思。

于是以其胸中之“私愤总难平”，数十年间念兹在兹，乃至诗作几无丝毫地域时局气息；更加上性格拘谨寡言，如黄润岳（1962）称：“蔡先生不多喝酒，也甚少高谈阔论，所以，他的书画，只能在他兴之所至的时候，送我一两件。我和他相交虽久，但蔡先生是比较拘谨的人，我总是称他为蔡老师。蔡老师的书画，恰如其人，一笔不苟，方方正正，道貌岸然。”因此至1970年其逝世时，陈宝书《哭蔡襄青》乃云：

自古才难共命争，哭君才气枉纵横。诗书画印超三绝，淡薄清愁过一生。落落孤怀人寡合，洋洋巨著世同倾。只今死别成追忆，冷雨秋窗怆旧盟。

其中“淡薄清愁过一生”与“落落孤怀人寡合”堪称写照。

整体而言，蔡襄青的诗书画印四绝是当时备受赞誉的，他作为20世纪初期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自是公论，而其诗歌在当时评价也是极高的，如1949年刘楚材应和其《戊子咏怀》第一首的开篇一句“文章憎命愧吾曹”，又同年林蕴光应和其另一首诗有云“青莲绣口才超绝”，再1959年陈宝书题其《战马吟》有云“挾藻携华才似海，羡煞中郎笔一枝”。这些虽难免溢美，但绝非虚话；而黄润岳（2005[1990]）对其诗作评价则最为平实，称：“他的诗，真正是旧诗。”这句话虽然与林连玉“用口语入律”的对比，但放诸当时新马旧诗坛而言实则特具深意。纵观蔡襄青的旧体诗造诣，以学养入诗，尤其七言律诗更属冠绝一时，不论是学养用典，乃至丽句隽语，从不以成语俗套入诗；虽其立意不免承袭，使用意象也属仍旧，但其化典入句，尤擅将古人字句嵌于诗行间，浑然天成。如其《读史四咏》（1949）之“沈炯”有云：

⁷ 《南齐书》云：“齐武帝病笃暂绝，萧子良在殿内，太孙未入。王融戎服绛衫，于中书省阁口断东宫仗不得进，欲矫诏立子良。”

⁸ 《陈书》云：“尝独行经汉武通天台，为表奏之，陈已思归之意。”

荒荒玉碗悲陵园，漠漠珠帘侈近臣。凄绝通天台畔路，烟霞俯仰信伤神。

其用典以沈炯《通天台奏汉武帝表》无疑，然其中多处化用文句，如沈表云“甲帐珠帘，一朝零落。茂陵玉碗，遂出人间”、“瞻仰烟霞，伏增凄恋”。又其咏孙楚有云：

卅载参军拜未迟，情文伉俪著于诗。凄然增重才真藻，隐尔韬光少独奇。厉齿偏教惊漱石，陈书孔切去浮辞。滔滔自是无微谬，只怨孙符不敢遗。

全诗以《晋书》为蓝本，云：“楚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多所陵傲，缺乡曲之誉。年四十余，始参镇东军事。文帝遣符劭、孙郁使吴，将军石苞令楚作书遗孙皓，劭等至吴，不敢为通。”又化用王济语云：“楚少时欲隐居，谓济曰‘当欲枕石漱流。’误云‘漱石枕流’。济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厉其齿。’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济。初，楚除妇服，作诗以示济，济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

对照原文与诗句则大略可见蔡襄青诗句中遣词用字的特点。由此出发，正是我们探讨林连玉在1949年底应和蔡襄青诗作的重要前提，惟其如此方能对林连玉之和诗做一番细致的解析。首先我们看林连玉所应和之蔡襄青的《书感》前四首：

无心笑骂入侯门，谁凤谁巢且莫分。喋血真堪诛吕氏，弃繻宁复识终军。可怜烽橧漕渠断，忍令崇墉版筑焚。叠掌倘教参李富，仁民未必著枢勋。

汉家宗室久陵迟，克念何当尽在此。果是狼居能接战，那堪鹤塞竟偏师。椎心失计清钩党，顾盼相期斩郅支。他日建旗宣下国，横空端待拥鸦儿。

将军有事在戈船，四顾昆明漠漠烟。终古英雄争据蜀，方今豪士亦趋燕。浑忘虎视眈眈在，肯笑狐疑窞未填。板荡居贞原自惜，岂甘羞耻比寒蝉。

要知何策北防胡，试问中原几骏驹。不尽尘沙清塞表，漫凭海徼负城隅。虽然能数檀家米，到底谁传董泽蒲。臣国邹阳终自致，背淮千里正归吴。

接续上文讨论蔡襄青之用典特点，以其第一首诗句云：“可怜烽橧漕渠断，忍令崇墉版筑焚。”这看似直接描写战火中城楼颓毁，实则当中“烽橧、漕渠、崇墉、版筑”等均语出鲍照《芜城赋》。

此外，其第三首之用典更是非常精巧，而且诗意接合转折也很巧妙。先看首联用汉武帝典故，《汉书》记载武帝攻打南越国，先在西安开凿昆明池习练水兵；其首联之“将军有事在戈船”，典出汉武帝元鼎五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甲为下濊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第二联的首句实具双重含义：承前以应武帝故事，指其据巴蜀以伐南越国；接后则指时事之共军围攻国民党成都据点，以及当时共产党掌权立都北京，即所谓“方今豪士亦趋燕”。这里由武帝事转接时事，堪比杜甫《秋兴》“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之借武帝以指涉唐玄宗事。而实则蔡襄青在这里运用的地理概念更具巧思，一来南越国境在广东，1949年10月中共军队亦进入广东，而蔡襄青家乡就在广东澄海，此则呼应首联“漠漠烟”即同时寄托乡情忧思；二来第二联以蜀和燕之南北分指国共二党，联系于时局之共军猛攻成都以应“争”字，则回看首联戈船将军之南下征伐亦成时事，然而同时又以“据蜀”转喻国民党抗日时期的重庆陪都。由此进而转入第三联，则其“虎视眈眈”者谁便成明朗，而“浑忘”者显即战时据蜀之国民党。这以其同组诗第二首云“椎心失计清钩党，顾盼相期斩郅支”，两相参照便得清晰明了，即当初“失计”未得清党，且更与之“相期”抗日。如此诗意之间的前后句照应，转折之间更无一字落空，确实诗艺纯熟，非常值得玩味推敲。据此往下末联之“板荡居贞原自惜”者，则当指国民党信守国共合作的约定；当然“居贞”二字也暗中指涉国民党魁蒋介石，即《易》豫卦“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而“自惜”二字则又牵连下句，均出《后汉书》杜密的典故，即其指责刘胜“见礼上宾，

而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这显然是为国民党与蒋介石开脱，即所谓“椎心失计清钩党”实乃其居贞守正，岂可比诸“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而耻同寒蝉。

实则蔡襄青《书感》发表于12月13日，其作诗的时候国民党的成都据点仅剩胡宗南残军已是不保，本地报章连日追踪蒋介石、阎锡山等等飞往台湾的传闻，加上孙立人在台湾的卅万军驻防也面临共军的威胁，美国官方“也恐怕国民政府无法守住台湾”。这些都是蔡襄青作诗期间所能接触的中国局势报道。（参看南洋商报1949c、1949d、1949e、1949f）

然而其《书感》组诗中不仅表现出对国民党的同情态度极为明显，甚至于仍寄望于国军反攻。而其政治倾向尤为突显的是诗中以汉胡对举，俨然拥国民党之正统。如其第二首称“汉家宗室久陵迟，克念何当尽在兹。果是狼居能接战，那堪鹤塞竟偏师”，此则明言“汉家宗室”，而“狼居”者即《汉书》霍去病北征匈奴，于狼居胥山祭天，其末乃云1949年年中的渡江战役，国民党“鹤塞”江西失守。另如第四首开篇云“要知何策北防胡，试问中原几骏驹”，以“北防胡”称其对抗共产党军队，也是明言汉胡分界。其实还有一些地方是用暗指的，比如第二首末联“他日建旗宣下国，横空端待拥鸦儿”，其中“鸦儿”典出《新五代史》李克用“少骁勇，军中号曰‘李鸦儿’”，似含希冀“复兴大功”之殷望；重点乃“下国”一词，应结合祢衡《鹦鹉赋》“背蛮夷之下国”，则亦是番胡指代共军。

由此出发则可明白其第四首寄希望于国民党据东南抵抗，甚至呼吁发兵反攻。其开篇“要知何策北防胡，试问中原几骏驹”，似有布告征召志士之慨；实则此前诗句“弃繯宁复识终军”、“叠掌倘教参李富”，便已用汉代终军弃繯、南宋李富募兵故事以示号召反攻。下联“清塞表”同样把共产党比作塞外番胡，且劝国民党莫要仅仅据守东南临海一隅。后二联则呼吁人心莫变，并支持国民党反攻北上。首先“檀家米”应以佛教檀越送米故事，“董泽蒲”原为古代的箭，取《左传》“董泽之蒲，可胜既乎”的典故；此外这里二句多少化用清初岭南陈恭尹诗句“东南竹箭曾无价，不数当年董泽蒲”，借指充实的军用物资供应。末联以《汉书》邹阳故事为鉴，劝军心莫要动摇，尤其当时国军上下已有不少降共。西汉邹阳原事吴王濞，吴王将反，邹阳等因谏阻吴王不听，“于是邹阳、枚乘、严忌知吴不可说，皆去之梁，从孝王游”，谁知后来梁王亦有反心，邹阳又谏阻而遭罪下狱。因此蔡襄青称其“终自致”，因梁王曾封为淮阳王，故诗云“背淮千里正归吴”。然而，不得不指出这里邹阳典故欠贴切，邹阳入狱后写了著名的《狱中上梁王书》，《汉书》称“书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更何况以邹阳前后谏阻二主谋反故事，也不尽符合这里的语境。猜想蔡襄青这里勉强用典，或许仍出于梁吴之地分南北的考量。

无论如何，正当1949年12月中国政治局势基本尘埃落定时，蔡襄青《书感》组诗表现出了对国民党的同情与拥护。因此其诗开篇虽云“无心笑骂入侯门，谁风谁泉且莫分”，似乎超然不偏袒，但经此前后分析则其感情倾向性相当明显。

林连玉《奉和蔡襄青先生书感元韵》解析

上一节通观蔡襄青的整体诗风，明显可见其思想层面乃主于诗以缘情，而总体缺乎言志；至于其《书感》则是较少见地明确表现出政治倾向之“言志”诗作。实际上哪怕是他此前的“缘情”之作，和诗者也仍见有以时局回应的，如1948年老庚应和其《秋思》有云：

月来连失数名城，到底何人喜用兵。左右谁怜百姓苦，是非只为一家行。运筹还愧武侯智，报国犹差项羽情。祸结中原仇者快，且看豪富篋盈盈。

八载干戈称五雄，一心一德赖群工。方欣建国凯歌里，却叹阅墙苦战中。人海滔滔流血海，秋风飒飒拥腥风。虽云刀斧堪挥舞，慎记华夷两不同。

这种笼统谴责战争且怜悯百姓的论调，在当时反映时局的诗作较多见。如上引诗句云“左右谁怜百姓苦，是非只为一家行”；即使稍涉国共斗争的内容亦感叹一句“却叹阅墙苦战中”，且立于民族情感称“虽云刀斧堪挥舞，慎记华夷两不同”，总之是没有明言“选边站”。

然而蔡襄青《书感》组诗则不然，不仅一反其往常“私愤总难平”的伤怀，甚且表现出较强烈的政治倾向。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自1948年以来多番的征和诗均几近于一呼百应，乃至前述《戊子咏怀》更在一年内就结集出版唱和诗作数十首，且题“第一辑”，可见蔡襄青对其诗友之应和很有信心，然而1949年底的这一组《书感》，明言“敬呈诸大吟坛正和”，但显然平时唱和的诗友均未有以应之者；乃至隔了一个月后的1950年1月初报章又刊登一遍。

而估计在蔡襄青意料之外的，1949年12月25日报章上刊登了一组林连玉《奉和蔡襄青先生书感元韵》（1949a）的四首七言律诗，乃唯一公开应和其《书感》的，其云：

雄师百万斗期门，兵刃才交胜负分。欲奋神威安九鼎，翻看折戟墨全军。就俘宛似牛羊糜，弃甲竟行玉石焚。似此将材真罕见，应堪倒彩喝功勋。

忍将赤子肆凌迟，蹙额万民痛在兹。越货原来非盗贼，杀人共指是官师。不思悔祸征前辙，竟藉公仇盾后支。乃祖有灵应陨涕，椎心恨煞败家儿。

金银捆载满楼船，信誓惶惶尽化烟。浩荡貔貅驱入海，联翩策士迫归燕。厚颜犹说师能武，强项都因壑未填。鸣鼓环攻何激烈，喧喧震耳异啁蝉。

莫谈卷土更攻胡，下驷材非千里驹。已见残棋余只帅，岂同猛虎负全隅。生民久作万冢哭，聚矢谁供一束蒲。踪迹原惭蜀汉相，休提遗恨失吞吴。

从各方材料看，此时林连玉与蔡襄青并无交情，而其二活动圈之唯一明显交集即同样结识黄润岳，且受其推崇，但这都是后话；就《书感》组诗唱和之1949年而言，此前亦无诗作唱和，这一点以林连玉诗题称呼“蔡襄青先生”亦可佐证。而林连玉之所以应和其《书感》，绝无以诗会友之意，尤其考虑其仅仅应和“半组”四首，而非全诗，因此其用意很明显，即纯粹就是针对蔡诗之思想立场作出回应，同时提出自己对形势分析后的相反意见。

首先，关于林连玉旧体诗的题材内涵与艺术风格已经不少人做过分析，其中最直接明了的当属黄润岳（2005[1990]）所论：“他的诗已成一格，文句浅白而不流俗，哪怕是俗语入诗，亦已融会贯注，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又云：“他对于写诗，并没什么兴趣。老一辈的文人，吟诗写诗，原是功课，所谓诗言志。”此外邱克威（2017）以其《学诗自白》为依据，称其“诗作不论主旨不论语言，都讲求‘分明显豁’”，绝不曲折表达，更不会像蔡襄青一样动辄把一己的私愤酿成前后古今之同悲，把时地的局势化成顾念天地之同怆；至于风格，则云：“林连玉的诗艺风格，即不虚设格调、不刻意艰深、不因循摘句、不堆砌辞藻；唯一追求是直抒胸臆，语言简赅，立意新颖，最关键的是感情要‘真’。”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想见林连玉与蔡襄青对诗的理解与主张近乎截然相反。基本上蔡襄青众多出于纯文学活动性质的酬唱诗作，林连玉是不做的。这在蔡襄青则是“提倡风雅”，而林连玉纯是一脉“诗言志”的主张，即《学诗自白》云“搜材径取心中合，险句每从笔下除”、“‘短钉獭祭’差能免，口与愿违未肯书”；尤其提出“未必多情余血泪，可真亡赖有箴规”，他是反对抒情诗作而强调谈事理的，即无志可言毋宁不作诗。林连玉《学诗自白》（1949b）与应和蔡襄青的《奉和蔡襄青先生书感元韵》几乎同期创作，此时的主张与实践应最契合。然而应和诗作有其规格，因此由于林蔡二人诗风上的巨大差异，造就了林连玉这组应和诗在其所有诗作中的特殊性：一则字句趋于典雅；二则诗意略微隐晦。于是乎虽则其整体诗风之“分明显豁”、“赖有箴规”，乃至免却“短钉獭祭”仍均贯彻如一；但这组诗在风格上确实展露了林连玉诗艺的另一侧面。

因此不论从林连玉对1949年中国局势的表态，或者其旧体诗艺术的角度出发，这组诗都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即此我们便能体会黄润岳讨论《连玉诗存》的文章何以独独称“我非常欣赏这一组七律”，且对其评价极高云“可以比诸杜甫”，乃至全文最大篇幅讨论这一首。只是黄润岳以来，至今讨论林连玉旧体诗的文章无一谈及这组诗，包括郑良树（1999[1995]）、邱克威

（2017），乃至李淑云（2016）、吴彩宝（2019）这两部近期以林连玉诗文为题的硕士论文，长篇万言书竟仍是对此只字未提。⁹

黄润岳对林连玉《奉和蔡寰青先生书感元韵》的评价极高，分析也最细致，其云：

我的所谓学究味，也就是某一种斯文气息。这斯文不是指文质彬彬的拘谨，而是《论语子罕篇第五》，孔子所说的：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这也可以说是道统的某种指向。例如第十四页，《步蔡寰青书怀元韵》便有：“欲奋神威安九鼎，翻看折戟墨全军”。这四首七言律诗，可以比诸杜甫。指事通俗，文词典雅。所谓典雅，不是古意盎然，而是化俗成雅，例如：“似此将材真罕见，应堪倒彩喝功勋”。喝倒彩是很通俗的字眼，但是经此安排，音韵铿锵，更把上一句蒙上了诗意。“似此将材真罕见”，原是口语似的。第二首的三四句，也似口语，但是并不觉得它俗气：“越货原来非盗贼，杀人共指是官师”。（黄润岳 2005[1990]）

至于这组诗与蔡寰青的唱和，则云“连玉的这组律诗，既是和他的，我却找不到原诗”，又从蔡寰青整体诗风评断：“他的诗，真正是旧诗，不像连玉可用口语入律。”这里所谓“找不到原诗”，姑作实况，然究不排除或有避嫌之隐情。其实黄润岳身为国民党员，又曾任国民政府外交官，而林连玉这一组诗对国民政府的无情批判，乃至声言反攻无望，黄润岳竟仍对其如此高度赞誉，可见确属真心欣赏其诗作。

黄润岳仅就林连玉和诗就已盛赞若此，实则他若一一对照蔡寰青原诗，肯定更能点出林连玉和诗的工整严谨，包括字句用典均掌握得分毫不差，微妙天成。至于诗作本旨，黄润岳肯定是明晰的，所以他说“道统的某种指向”，但后文既称“林连玉被看成左倾分子”，或许因此其文中选择不予道破；然而若能撇开那层包袱，则林连玉“分明显豁”与“赖有箴规”的思想内涵便得益彰。综合分析，林连玉《奉和蔡寰青先生书感元韵》无疑是历来本地应和诗中的上乘之作。

首先“雄师百万斗期门，兵刃才交胜负分”，一反蔡寰青开篇“谁风谁臬且莫分”为其后续保存国军反攻幻想的铺垫，劈头直言“兵刃才交胜负分”；巧妙之处在于应蔡诗第三首用武帝朝戈船将军南征故事，及其第二首称“汉家宗室”与“那堪鹤塞竟偏师”均指共军渡江战役，这里开篇第一句“雄师百万斗期门”也同样指共军直逼首都南京，而“期门”一词更直接关涉汉武帝故事，《汉书》称建元三年，“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

第二联以下林连玉继续讥讽国军作战无能。蔡诗在此举汉代终军弃繯，“大丈夫西游，终不复还”的誓死决心，以及南宋李富散财募兵抗金保卫临安的故事，激励国军团结人民抵抗共军。而林连玉第二联首句“欲奋神威安九鼎”既呼应蔡诗全首，更遥指国民党反攻的号召，但紧接着“翻看”则急转直下，先是“折戟”、“墨全军”，再是“就俘”、“弃甲”，回应首联“兵刃才交胜负分”；如此兵败如山倒，于是末联乃归结云“似此将材真罕见”，且应和蔡诗中“著枢勋”语进而调侃称“应堪倒彩喝功勋”。

第二首同样开篇就是针锋相对，蔡诗“陵迟”、“在兹”纯由国民党“汉家宗室”出发，均指其治统而言；林连玉巧妙地仍袭其用语而“偷换概念”。首联“忍将赤子肆凌迟，蹙额万民痛在兹”，以国民党腐败统治下的百姓遭戮，起而代民立言称“痛在兹”。第二联“越货原来非盗贼，杀人共指是官师”，力道强劲，黄润岳所谓“可以比诸杜甫”者正为此等语。以下二联则更进一步分析国军败退原因，反对蔡诗以国民党当初错失清党乃至相期合作抗日为如今败因的“椎心”之痛，林连玉明言指其“不思悔祸”的咎由自取，遑论更变本加厉地“竟藉公仇盾后支”，指国民党兵败之际抢运黄金。如此则别说指望“他日”如何，就连“乃祖有灵应陨涕”，于是放言蔡寰青者流，“椎心”之痛实更应为“恨煞败家儿”。

第三首开篇“金银捆载满楼船，信誓惶惶尽化烟”，既应和蔡诗“戈船”语，同时又紧接前一首“败家儿”的话头；国民党“不思悔祸”，更以“金银捆载满楼船”抢运黄金，此时哪里还

⁹ 李淑云（2016：123）对林连玉诗作的材料整理上出现较大偏颇，并据此称蔡寰青为林连玉诗歌唱和的朋友，这是不准确的。

顾得百姓生死，更不用说“新生活”之礼义廉耻等节了。第二联仍紧扣蔡诗造语，首句嘲讽蔡诗以国民党喻“英雄争据蜀”，而戏谑之“浩荡貔貅驱入海”，即以“浩荡貔貅”形容其仓皇“入海”落逃；下句话锋一转乃指民心“归燕”，实即国民党残暴腐败统治之所“迫”。其下二联笔力加劲，将蔡诗仍复沉溺“浑忘”云云之“失计清钩党”的锥心之痛，扎扎实实地拽回到当下，揭露其反攻计划“厚颜犹说师能武”，同时更进一步直斥其党国要人坚称反攻的“强项”姿态实则纯是一己私心，即个人之欲壑难填。末句之“鸣鼓”取典《论语》“鸣鼓而攻之”，呼应首句“金银捆载满楼船”之“聚敛”义；而结尾更是力道十足，以其不顾及百姓民生的抢运黄金，激烈的天怒人怨“喧喧震耳”，借此反衬蔡诗刻意美化国民党之“板荡居贞原自惜”，故云“异啁禅”。

第四首堪称全诗与蔡诗最为紧扣的，直是字字句句有呼有应。上节分析蔡诗这一首呼吁国民党反攻，且寄望全民支持反攻；林连玉则开篇第一句就一大盆冷水下淋，云“莫谈卷土更攻胡，下驷材非千里驹”，指出关键在于领导才德低劣。下一联更是当头棒喝，直言莫说是反攻，目前退守台湾恐怕是连“负隅反抗”尚且不得，即难以自保了。第三联进一步反驳蔡诗冀望人民支持反攻，云多年战乱下来“生民久作万冢哭”，现在应是休养生息，恢复人民生计之时，别说是向民间征集军用物资，即使“一束蒲”恐怕都供应不上来。末联看似突兀，实在是内外有呼应：一则接前句束蒲聚矢暗含草船借箭故事而引入“蜀汉相”孔明；二则应和蔡诗“背淮千里正归吴”而带出孔明“遗恨失吞吴”。然而从全诗引典来看，与蔡诗末句用事失当类似，这里援用孔明故事，虽则可隐含六出祁山的统一大业，但毕竟还是有些不够贴切。

整体而言，林连玉《奉和蔡寰青先生书感元韵》组诗为我们提供了其诗艺风格的另一侧面，即其能俗能雅的风格张力，又其亦俗亦雅的笔锋造詣。当然，他一贯主张的“分明显豁”、“赖有箴规”特征同样完整展现，尤其犀利的笔尖，无情戏谑的幽默，一一表露无遗。黄润岳称“非常欣赏这一组七律”，良有以也。至于其对1949年底中国局势变化的观察分析，则突显其诗艺“立身端耻傍人庐”的立新意特征；黄润岳引诗言志论，称其乃指涉“道统的某种指向”，足见他对林诗的题旨是明晰的。同时正如上文所分析，林连玉1949-1951年间对中共政治变化观察非常细致，对其认识也是逐渐变化；最关键的是本组诗旨在揭露国民党腐朽统治及其兵败的成因，进一步分析反攻无法实现的因素，同时从民本立场出发主张停止内战。这里丝毫未涉及“欢迎新中国”的内涵。

结语

林连玉和蔡寰青在1949年底的这组《书感》唱和诗，从本地旧体诗的发展来说都堪称上乘诗作。除了诗歌艺术上值得细细推敲，更重要是为我们留下了当年本地诗人“以诗言志”来表达对中国时局的态度和分析。

1949年国共内战前后的形势变化确实牵动着当时的华人社会，其中各阵营意见与言行固然是复杂多层的，但仅仅从中文报章留下的报道与评论来看，当时整体情绪多倾向于国民党；只是一来也许地域相隔，二来或是政治认知，主流意见似乎都不见得是“一面倒”的。我们举1949年2月份一篇诉诸“今日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平”的社论，云：

为了保存国家民族仅存的一点元气，为了拯救可怜的老百姓，这可诅咒的内战是必须停止的。从来没有内战是光荣的，反之，内战实为国家最大的耻辱。若以个人厉害之得失，观内战为光荣与否，这是离开了国家民族立场的说话，也就是叛国的罪人。其实内战若今天停止了，中华民族今天就获得了光荣。内战一天不停，中华民族就一天没有光荣；内战一年不停，中华民族便一年没有光荣。甚且海外的孤儿也将因祖国之不争气而遭遇更巨大的迫害。……倘在此时，国共间任何一方已有真诚的意志寻求和平，另一方就应加以愉快的接受才是。要知国民党和中共都是中华民族自己人，在前已经碰过一次杯喝

过香槟酒，难道现在就不可以再碰一次杯吗？为国家民族生存而抛弃政敌仇见，才是伟大的政治家，才是伟大的爱国者。（张复灵 1949）

乃至到 1949 年 10 月大局基本落定，本地华人仍是以政党轮替的认知理解这场内战，如云：

今日中共领导新政权人物，都如中共所宣传，工人阶级、农人阶级、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可谓尽田亩、版筑、鱼盐、海市或士人各界人才盛运。这确是划时代的新中国的刚建的活跃的作风，富有自力的更生的磅礴的气象。我们期望真正的三民主义志士与新民主主义并行为一种中国政治的灵魂，为一种中国求治的盐梅。中国拨乱反治，正当其时啦。当中共执政伊始，海内外舆论界竞颂中共解放战伐事业，而未闻正义明道诤言。但举世之所是者，未必为是；举世之所非者，也未必为非。是非之间必须诉诸事实，诉诸真理，然后发现真是非之所在。兹值中华民国创造三十八届双十佳节，我们站在海外新闻言论界，遥想祖国，纵论中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我们请海内外同胞奋起主人责任，共同为国家为人民自由平等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日庆祝双十节历史意义和使命。（南洋商报 1949b）

这种以民为本的党国二分政治愿望，乃至国共并存协同治理的“共和”体制认知，这显然同当时中国时局的实际有距离，其后续之发展更是大大相违。正是这种政治认知出发，1949 年双十节国庆日，林连玉在当年就坚决表示反对更改国庆日，云：“北京人民政府成立，宣布更换了国旗与国歌，我觉得都是无所不可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争论可否。独有宣布更改国庆，却不是平常的一件事，至少在我个人不敢苟同，敢示反对。”全文据理客观分析，同时援引法国的例子，称：

我们试看看法国。他们的共和，已经是第三次了，他们的国庆，还是攻打巴士的监狱那一天。为什么不采用第二共和的纪念日？为什么不采用第三共和的纪念日？甚至这一次大战，全国沦陷了，和平以后，获得更生，为什么又不采用复国纪念日？从此，可知规定国庆，要从客观上去分析历史。张勋复辟、马厂誓师，也可以定为国庆日；军阀纵横、北伐誓师，又可定位国庆日。请问如此一来国庆纪念还值得几文钱？然而，过去蔡锷、段祺瑞、蒋介石，并没有那样做。为什么现在偏偏要这样做呢？……总而言之，我是反对更改国庆的，因为双十节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分水岭，不是普通的历史里程碑。（批鳞 1949）

这种基于历史正义与人民本位的理性分析乃至立场主张，这正是林连玉毕生一以贯之的准绳。

此外，我们上文已指出林连玉在 1949-1951 年的杂文多分析讨论中国形势发展，这时期对中国国情关注度非常高，尤其后期对中共统治提出不少批评与嘲讽；从 1951 年开始则完全转而全身心投注于本土课题的讨论。论者称：“1951 年可说是林连玉确立从‘中国倾向’转化为‘本土意识’的分水岭时期。”（吴彩宝 2019：56）实则称其 1951 年以后基本不做中国国情讨论，这是准确的；但其 1951 年以前绝非不做“本土意识”的思考，前引《双包案》就是表明中国国情与本地华社之未可二分。或者还可以这么说，1951 年以后的转向成因或属多个层面，包括国际局势与新马政治，但他不再对中国局势进言则多少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变化相关。

于是其后林连玉献身本土华人社会与文化的建设工作，尤其是维护本地华文教育。以这组《奉和蔡寰青先生书感元韵》应和诗中所提“念兹在兹”为例，黄润岳（2005[1990]）非常清楚其前后精神投注的变化，于是 1990 年重读其《连玉诗存》，写下一篇《读〈步蔡寰青书怀〉》与之遥和，诗云：

蹙额痛在兹，华校事日非。今朝万人宴，登高只一呼。

林连玉这前后之“蹙额痛在兹”似恰可为其“中国观”之变化下一注脚。

参考文献:

- 陈宝书 1970。《哭蔡寰青》，新加坡：《星洲日报》，9月14日。
- 蔡寰青 1948a。《戊子咏怀》，新加坡：《南洋商报》，11月6日。
- 蔡寰青 1948b。《秋思》，新加坡：《南洋商报》，12月6日。
- 蔡寰青 1949a。《书感》，新加坡：《南洋商报》，12月13日、20日。
- 蔡寰青 1949b。《奉酬海角诗人》，新加坡：《南洋商报》，7月28日。
- 蔡寰青 1950。《谢题拙著今战场吟集》，新加坡：《南洋商报》，12月8日。
- 蔡寰青 1952。《未庵习画漫记》，载蔡寰青《未庵画记》P5-6，新加坡：时中出版社。
- 蔡寰青 1953。《归思》，新加坡：《南洋商报》，6月22日。
- 蔡寰青 1956。《春兴》，新加坡：《南洋商报》，7月15日。
- 蔡寰青 1959。《为战马吟自嘲》，新加坡：《南洋商报》，11月15日。
- 蔡映澄 1950。《寰青兄惠赠〈微风〉两辑赋此酬谢》，新加坡：《南洋商报》，3月18日。
- 大朋友 1950。《儿童节亦闹分家》，新加坡：《南洋商报》，4月4日。
- 何国忠 2002。《林连玉：为族群招魂的故事》，载何国忠《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文化与族群政治》P49-87，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
- 何启良 2015。《百年连玉：论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历史上的林连玉》，载陈绿漪等著《林连玉研究论文集》P25-62，吉隆坡：林连玉基金。
- 何须名 1950。《恭读遗嘱》，新加坡：《南洋商报》，11月27日。
- 黄润岳 1962。《蔡寰青的诗书画》，新加坡：《南洋商报》，8月3日。
- 黄润岳 2005[1990]。《〈连玉诗存〉读后》，载李亚邀主编《族魂林连玉续编》P191-198，吉隆坡：新纪元学院、林连玉基金、马来西亚留台联总。
- 纪雪 1950。《一面倒》，新加坡：《南洋商报》，10月1日。
- 老庚 1948。《秋思——和蔡寰青先生秋思原韵》，新加坡：《南洋商报》，12月25日。
- 李淑云 2016。《林连玉生平与其诗文写作》，雪兰莪：博特拉大学外语系中文组硕士论文。
- 林连玉 1949a。《奉和蔡寰青先生书感元韵》
- 林连玉 1949b。《学诗自白》，新加坡：《南洋商报》，12月29日。
- 林连玉 1986。《次蔡寰青一梦元韵》，载《连玉诗存》P38，吉隆坡：林连玉基金。
- 林蕴光 1949。《步蔡寰青君志谢元韵》，新加坡：《南洋商报》，11月27日。
- 刘楚材 1949。《步蔡子寰青戊子旅怀原韵》，新加坡：《南洋商报》，7月27日。
- 鲁虎 2014。《新马华人的中国观之研究 1949 - 1965》，新加坡：八方文化。
- 南洋商报 1949a。《戊子咏怀酬唱集第一辑已出版》，新加坡：《南洋商报》，8月10日。
- 南洋商报 1949b。《庆祝双十节——继续为自由平等而奋斗》，新加坡：《南洋商报》，10月10日。
- 南洋商报 1949c。《成都官员仓皇逃难，总统府人员飞海南转台湾》，新加坡：《南洋商报》，12月6日。

南洋商报 1949d。《传蒋将由蓉飞返台湾，二十四小时内复职》，新加坡：《南洋商报》，12月8日。

南洋商报 1949e。《阎锡山声明蒋不复职，随军政府计划取消，政院假台北宾馆昨开始办公》，新加坡：《南洋商报》，12月10日。

南洋商报 1949f。《台湾面对经济难题，美经合署计划扩张中日贸易，华府官员担心国军不能久守》，新加坡：《南洋商报》，12月10日。

南洋商报 1950a。《隆华教师公会主张恢复六六为教师节》，新加坡：《南洋商报》，5月29日。

南洋商报 1950b。《联合邦教育部公布明年度华校新校历》，新加坡：《南洋商报》，11月19日。

批鳞 1949。《反对更改国庆》，新加坡：《南洋商报》，10月17日。

批鳞 1950a。《论德》，新加坡：《南洋商报》，1月10日。

批鳞 1950b。《代敌立论》，新加坡：《南洋商报》，1月15日。

邱克威 2017。《林连玉〈吉隆八景诗〉释义——兼论林连玉的诗艺风格》，《台湾东南亚学刊》第11卷第2期，P141-159。

太璞 1951。《灌迷汤》，新加坡：《南洋商报》，10月2日。

吴彩宝 2019。《林连玉诗文中的大我与小我精神》，吉隆坡：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硕士论文。

吴钩 1950a。《是唯心论当权的时代》，新加坡：《南洋商报》，6月27日。

吴钩 1950b。《谈偶像》，新加坡：《南洋商报》，7月13日。

尤春 1950。《双包案》，新加坡：《南洋商报》，10月2日。

张复灵 1949。《今日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平》，新加坡：《南洋商报》，2月6日。

郑良树 1985。《华族社会第一世家——敬悼林连玉先生》，吉隆坡：《南洋商报》，12月21日。

郑良树 1999[1995]。《论林先生人格和情怀——读〈连玉诗存〉后》，载郑良树《马来西亚华社文史论集》P66-72，新山：南方学院。

钟瑜 1999。《马来西亚华人美术史（1900-1965）》，吉隆坡：正山国际设计艺术集团、马来西亚艺术学院东方艺术研究中心。